

心怀使命的 反传统斗士

卡米拉·安德森采访李卡多·豪斯曼，他
其一生都在追求发现驱动经济发展的力量



拥有40多年的在政府、学术界和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验的李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一直在探寻国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他喜欢把发展比作拼字游戏。“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可以放在一起的字母组成新单词的过程。这就是发展的方向。”他坐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那间阳光充足的办公室里如是解释道。

他说,这种对揭示推动发展的力量的热情贯穿他的职业生涯。“我从不认为我在做不同的职业。我认为我是在不同位置做同样的事情。”

突破限制

豪斯曼自2005年起担任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2000年以来一直担任经济发展实践学教授。他利用在哈佛大学的这段时间,不断改进并提炼对经济增长和限制的思考,这些限制可能是一个国家发展面临的一个或两个最大的障碍。他直接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密切合作,帮助他找出新的增长源。

他解释说,“让我尤为困扰的是,很多人都找不到真正有效的商业模型。我所知道的大部分国家都被束缚在它们偶然进入的一个行业中,而这个行业通常曾经改变了整个国家,包括咖啡、可可、石油或者旅游业等各种各样的行业。”

为探究这些选择背后的推动力,2005年豪斯曼与他在哈佛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丹尼·洛迪克(Dani Rodrik)和安德烈斯·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一起,研究了增长诊断学。其主要观点是,每个国家都可能遇到自己独特的限制条件,必须对此加以理解和应对。“他参与开创的增长诊断方法是一个实用的政策工具和艺术的组合,”兰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如是表示。普利切特是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实践学教授,是豪斯曼的同事,也是朋友。

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工作是他多年前在委内瑞拉发起的对话的产物。“我第一次见到李卡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加拉加斯召开的一场关于外债的会议上,”罗德里克(Rodrick)回忆说。“他带着我在加拉加斯的街道上散步,并不停地谈论经济、机构和发展问题,一些我们完全做错的事情。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这家伙在说什么?之后,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多年

来,我经常跟我分享他的看法,我也从中受益匪浅。他在业内风格独特,能将作为决策者的务实触觉和作为学者对思想的追求结合起来。我把他带到肯尼迪学院是我最大的成就之一。”

事实上,增长诊断方法是豪斯曼对待经济学的一般方法:总是超越经济学理论去测试经济学理论跟现实情况的对立。“李卡多几十年如一日,全身心投入对实体经济的研究当中,政策制定不会让他分心,反而是他对经济学更新、更深刻理解的来源,”普利切特补充说道,“李卡多在追寻经济学事实方面很有天赋,即使在那些左派和右派教条主义都很容易引入歧途的问题上,他也能找到事实依据。”

不要害怕跨学科找寻新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豪斯曼对于正统金融经济理论没有多少耐心,也没有深入探究的兴趣。“我认为,好的经济学的推动力是尝试理解问题,承认问题”,他这样说道。“在大部分情况下,学院派经济学都是先有解决方案,再去找问题。”

豪斯曼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跨领域,积极实践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困难问题。“他使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历史、哲学、心理学、物理学,甚至是分形几何学等工具来解决问题。他可以结合几个不同领域,将其优雅地综合起来,创建他自己独特的分析框架,”他曾经的学生杜伊古·古文(Duygu Güven)如是表示。杜伊古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研究员,目前在土耳其财政部工作。

有所不同

豪斯曼致力于寻找答案的来源可以追溯到委内瑞拉。他的父母都是二战时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离开德国和比利时后,定居委内瑞拉。他们以生产皮包为生,但委内瑞拉服装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时并不景气,服装厂商离开委内瑞拉去寻找更便宜的生产地。当时,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服装生意卖掉,那以后该怎么办?做服装生意是我们唯一的专长。”

父母的困境引发了豪斯曼开始反思人力资本在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的想法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掌握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的生产能力,然后可以重新组合的过程,”他

这样说道。探索人力资本在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原动力。

豪斯曼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工程学和应用物理学学士学位。但他很快放弃了物理和工程学，专攻社会科学。他说，“在委内瑞拉学习电子没多大意思，不如学习委内瑞拉的经济，因为电子处处都一样，而世界各地的经济则各不相同。”

在获得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后，豪斯曼回到委内瑞拉教授经济学。1984年，他成为几个政府部门的经济顾问。1992年，豪斯曼被任命为协调和规划部部长，同时成为委内瑞拉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1994年，他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成为美泛开发银行的第一首席经济学家。

原罪与暗物质

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六年里，豪斯曼仍然在继续思考委内瑞拉的经济，并在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内广泛分享。为什么经济会受到长期波动的影响？他与迈克尔·加文（Michael Gavin）、埃内斯托·塔尔维（Ernesto Talvi）和罗伯托·佩罗蒂（Roberto Perotti）一起，探究为什么财政政策似乎总是顺应经济周期：财政政策不但没有稳定经济周期，反而加剧了紧缩，扩大了繁荣。财政政策加剧经济周期的现象引导豪斯曼及其同事得出结论认为，一些国家采用亲周期性的财政政策是因为它们的借款能力也是顺应经济周期的：它们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可以进入市场，但在经济状况差的时候则不然。

豪斯曼和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创建了“原罪”这个词，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无法从国外借入本国货币，只能借入外币（如美元）的情况。如果一国“有原罪”，则将造成外债积累。正如，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以刺激发展和经济增长，但这会导致在资产负债表上货币错配，如果其国家货币贬值，债务就会增加，从而导致经常违约。

豪斯曼关于原罪的理论受到过很多经济学家的挑战，如卡门·赖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这些经济学家不认为货币错配会导致债务问题，他们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问题是“债务不耐”，也就是说，

没有能力处理发达经济体可以轻而易举地管理的同等债务水平。他们表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连连违约。

豪斯曼的物理学背景启发他想出了一个吸引人的术语“暗物质”，来解决国际金融统计中的一个难题：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其从外国资产当中获得的盈利超过其为外债支付的利息，这是怎么做到的？在他2005年的论文“美国及全球不平衡：暗物质能避免大爆炸吗？”当中，豪斯曼和费德里克·斯图尔泽纳格（Federico Sturzenegger，现任阿根廷央行行长）使用“暗物质”来描述无形资产，例如一些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出口的专有技术，这些可以产生大量收入来抵消美国外债支付的利息。在物理学中，暗物质只能通过它所产生的引力来观察。在国际金融统计中，它的存在只能通过它产生的收入来推断。

与原罪一样，暗物质假设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从华盛顿到波士顿

在泛美洲开发银行任职期间，豪斯曼也参与制定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就是10条经济政策措施，后来其变成危机中经济体改革的标准，但是也广受批判。豪斯曼参与了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的研讨会，后者第一次在此描述华盛顿共识，并且他还为威廉姆森的书撰写了有关拉丁美洲的一章内容。他解释道，“在某种意义上，‘华盛顿共识’实际是一个拉丁美洲的共识，内容是关于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异常的不平衡问题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豪斯曼开始对这些政策是否能达到经济理论预期的效果越来越怀疑态度。虽然存在一定正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实施改革的国家比没有改革的国家表现要好一些，但到了90年代末，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蔓延到拉丁美洲，导致1998—2002年的经济增长倒退。

“这迫使我重新思考。也许增长背后的原因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多得多，”他说。“我们开始研究阻碍经济发展的，但之前从未考虑到的其他事情。而这正是我搬到哈佛大学的原因。”

对答案的不断探寻引导豪斯曼提出了“经济复杂性”的概念。这个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07年7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很多经济学家将复杂性视为他对于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IMF研究部的克里斯·帕帕耶奥尔尤(Chris Papageorgiou)如是说。

豪斯曼在他的网站上表示：“生产复杂东西的秘密并不是雇佣聪明人，而是让很多拥有不同意见和互补技术的人参与其中。富裕的国家有更多的集体知识，并利用这些知识来生产各种各样更复杂的产品。”他说，贫穷的国家只能制作几个“简单的产品”。

李卡多在追寻经济学事实方面很有天赋，即使在那些左派和右派教条主义很容易引入歧途的问题上，他也能找到事实依据。

利用哈佛大学强大的资源，以及跨学科领域的方法，从物理学、经济学、公共政策以及网络和计算机科学的专业背景知识着手，豪斯曼开始探究社会是如何让生产性知识融入社会当中。根据这项研究，豪斯曼撰写了《经济复杂性图册——绘制通向繁荣之路》(The Atlas of Economic Complexity—Mapping Paths to Prosperity)。本书于2011年出版，试图衡量生产知识在每个国家的数量。

一切才刚刚开始。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增长实验室如今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构建知识的复杂网络而开展的。增长实验室在2011年时最初只有两个成员，后来逐步发展为2017年的40个。团队里有数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编程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高级视觉专家，以及沟通专家。这些专业人士帮助维护并开发这个意义重大且包罗万象的网络。

该工作的主体部分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在分析经济和提供政策建议上。很多国家也与国际发展中心有直接合作，包括阿尔巴尼亚、墨西哥、巴拿马和斯里兰卡政府。

可能有些讽刺的是，委内瑞拉这个出产了发展经济学大师的国家，最终却遭受了几十年里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

豪斯曼在描述国家状况时直言不讳。“对于委

内瑞拉的灾难性衰退，没有任何借口。这是政策失败导致的。这道理人人都懂。多重利率制度、缺乏财政管制、失衡、产权不确定性、松散的货币政策、价格管控，这些政策可以摧毁一个社会。这也是人尽皆知的道理。”

正因为他直言不讳的批判，委内瑞拉政府宣称委内瑞拉不再欢迎豪斯曼。但这并没有妨碍豪斯曼不断研究自己国家的事务，并建立了研究模型，着重关注如何帮助委内瑞拉走上恢复增长的正轨。

表现基因

豪斯曼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氛围中的魔力似乎也被带到了课堂上。实际上，跟其他优秀教师一样，他也是一个表演者。乍一看，他的三个子女的职业道路都跟他们的父亲完全不同：一个是博物馆馆长、一个是剧作家，另一个是喜剧演员，但本质上他们有个共同点：都具有表演天赋。

塞巴斯蒂安·布斯托斯(Sebastian Bustos)是李卡多曾经的学生，也是后来李卡多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同事，目前工作于布鲁金斯学会。他描述了豪斯曼的学生曾给予豪斯曼演员那样的终极称赞：鼓掌喝彩。“学期结束时，一切都即将落幕，你就开始明白我们讨论过所有的话题的深刻意义，通常课程结束时每个学生都会鼓掌，他们非常非常开心。”

帕帕耶奥尔尤想知道，李卡多下一步会去往哪里？“李卡多在金融行业格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于他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的未来之路充满期待。”[FD](#)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CAMILLA LUND ANDERSEN)是《金融与发展》的主编。